

国际语学理论形成的主要阶段¹

С.Н.库兹涅佐夫/著 张瑞承/译

(国立莫斯科大学语文学系普通暨历史比较语言学教研室, 莫斯科, 俄罗斯 119992)

提 要: 国际语学自 1931 年第二届国际语言学大会正式认可至今一直属于语言学领域。然而, 雷内·笛卡儿及其他学者于 1629 年即已提出关于该学科的基本想法。雷内·德·索绪尔(费迪南·德·索绪尔的胞弟)于该学科形成过程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该学科主要的研究对象为“计划语言”(плановые языки), 也就是应国际需求而制定并为一群说话者所接受的人工语言。

关键词: 国际语学; 国际语言(跨语言); 人工语言; 计划语言; 世界语; 世界语学; 逻辑主义; 经验主义; 雷内·笛卡儿(Р. Декарт); 梅斯曼斯(Ж. Мейсманс); 叶斯柏森(О. Есперсен); 雷内·德·索绪尔(Р. де Соссюр); 库裘拉(Л. Кутюра)

中图分类号: H9-09

文献标识码: A

1 国际语学(интерлингвистика)的研究对象

近数十年来国际语学在研究对象方面的理解已有实质进展。1911 年比利时学者梅斯曼斯(Ж. Мейсманс)提出术语“国际语学”, 并将其定义为一门关于“共同辅助语形成的自然法则”的学科, 他指的是任何可以成为跨语言, 甚至跨方言交际媒介的语言, 亦即自然语言及人工语言(Meysmans 1911)。梅斯曼斯认为, 国际自然语言形成过程的定律亦可复制至作为媒介的人工语言。

丹麦语言学家叶斯柏森(О. Есперсен)更广泛地理解国际语学的任务, 他使该术语得到语言学界的关注: 据叶斯柏森的定义, 国际语学“属于语言学领域, 它研究所有语言的构造及其主要概念, 同时, 它以制定跨语言(interlanguages), 即国际人工语言的规范标准为目的”(Jespersen 1931: 1)。此定义须以自然语言的比较研究与通用语法的建立为前提, 该语法则必须成为建构人工语言, 以及评定各种被提出之方案的理论基础。以此立场而言, 国际语学实际上相当接近类型学与普通语言学。因此, 30 至 40 年代由美国国际辅助语协会首倡, 并由萨丕尔(Э. Сепир)、斯瓦迪士(М. Сводеш)、柯林森(У. Коллинсон)等人所着手的国际语学研究并非偶然, 这些研究统称为“语言基础”(Foundations of language)。

战后, 国际语学致力于作为跨越语言藩篱的方法之一, 亦即国际人工语言的研究。将国际语学理解为语言学分支的趋势于焉出现, 它研究的是跨语交际整体理论架构下的国际语言。该期间出现相当多的论点, 根据这些论点, 国际语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当代各民族语言交互作用的过程、国际词汇形成的研究、各种不同人工语言的深入研究及其构造的预测、人工语言功能性试验的分析及其相对于自然语言之功用可能性的鉴定(请见 Григорьев 1966: 37)。

由此可见，对于拓展国际语学研究范围的追求不曾停止。然而，国际语学理论的中心问题仍为人工语言的研究，若这些人工语言可实践于交际中，即称为“计划语言”（плановые языки）。研究此类语言有两种不同方法。

人工语言的建构是以特定的理论前提为基础，该情况下，理论超前语言。然而，当人工语言被群体说话者接受后，可从根本上不同的方式——人工语言在交际过程中实际运用及发展的角度——来进行研究，此种研究下，语言则超前理论。上述第一种情况，理论普及任何已被实践及未能实践于交际的国际人工语言，此种比语言更早的理论我们称之为“语言计划理论”（теория лингвопроектирования）。第二种情况，理论之于语言为次级顺位，并仅普及实践于交际的系统（也就是计划语言），此种理论则称为“计划语言功能理论”（теория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ния планового языка）。

历史上，语言计划（亦即建构人工语言的尝试）早于语言计划理论，而语言计划理论又早于计划语言功能理论。已知最早尝试建构人工语言是在古希腊罗马时代（Кузнецов 1987: 52 及其之后），但它们仅依据普通的语言观念来建构，而未以专业理论为基础。专业理论出现于数世纪之后，且该理论之研究开端有文献依据：1629 年 11 月 20 日雷内·笛卡儿（Р. Декарт）致天主教神甫梅尔森（М. Мерсенн）的信，被公认为对该问题的首次理论发表。而计划语言功能理论在人工语言得到社会承认及实际运用后方能出现。众所周知，第一个开启支持国际语言群体运动时代的计划语言为 1879 年正式发表的“沃拉普克语”（волапюк）。上述间隔 250 年的两个时间点（1629 及 1879），乃是人工语言理论及其历史分期的自然时间点，根据上述时间点可区分为三个主要时期：

- （一）1629 年前——个别语言方案，它们之间通常欠缺理论的延续性；
- （二）1629 至 1879 年——语言计划理论的形成及发展；
- （三）1879 年后——语言计划理论的持续发展及计划语言功能理论的形成。

前两个时期与人工语言的历史有关，却与国际语学无关。国际语学作为语言学分支的历史始于第三个时期，也就是当语言计划理论与计划语言功能理论结合并互补：语言计划理论深入研究人工语言，计划语言功能理论则研究被社会实际运用于交际的系统。

两次世界大战可将第三个时期再分成三个时期。1879 至 1918 年主要的国际语学学派相继成立，并出现普通国际语学，它研究国际人工语言相互之间和国际人工语言与自然语言之间的比较。同时亦出现个别国际语学，它研究具体的计划语言。关键时刻为 1911 年，一方面，梅斯曼斯在被援引的文章中给予“新学科”国际语学第一个定义；另一方面，雷内·德·索绪尔（Р. де Соссюр—费迪南·德·索绪尔（Ф. де Соссюр）的胞弟）则为个别国际语学—世界语学（эсперантология）奠定基础。在普通语言学架构下，此时期亦进行针对人工语言问题的重要辩论（Кузнецов 1987: 183 及其之后），但国际语学仍未获得相当于语言学领域的正式地位。

1918 至 1945 年间，国际语学确定成为语言学的领域。国际语学与应用语言学各学派的关系亦渐发展，尤其术语国际化的研究更有助于上述关系的进展。此时期的关键时刻为 1931 年，第二届国际语言学大会上正式认可国际语学为语言学的新领域。

1945 年后的主要任务为确立各种计划语言在世界语言中的地位。这与以下两种情形有关：第一是被使用的国际自然语言数目急遽增加（相对于国际联盟使用的两种语言，联合国官方语言由原本五种变为六种），第二是人工语言的新种类——电子计算器语言出现。

国际语学的地位自此改变，进而影响该学科研究对象的定义（Кузнецов 1987: 26）。就目前状况来说，国际语学被确立为一门研究国际语言且更专注于研究不同种类计划语言的学科。国际语学的问题成为国际语言学大会及其他专业领域大会的研究对象。国际语言议题被

纳入 1946 年第六届国际语言学大会的议程；1987 年在柏林举办的第十四届国际语言学大会上，此议题再度受到关注：大会中举办探讨国际语学及人工语言的“圆桌会议”，各场次亦有相关文章的发表（如：Sakaguchi 1987）。关于国际语学的文章曾发表于 1986 年在新德里举办的第十一届国际社会学大会、1987 年在莫斯科举办的第八届国际逻辑学、方法学暨哲学大会等（Кузнецов 1986；Kuznetsov 1987）。1980 年于比利时那慕尔举办的第九届控制论大会上，除了英语及法语外，世界语（эсперанто）亦被纳为大会的使用语言，共有 27 篇以世界语发表的文章，探讨了国际语学家及控制论专家关注的许多问题（Kibernetiko de la homa lingvo 1981）。

随着国际语学与其他学科的外部关联愈加扩展，该学科研究对象的准确定义及其发展方向则愈加重要。本文将详述该学科最重要的部分——语言计划理论与计划语言功能理论的形成过程。

2 语言计划理论

如上所述，语言计划早于语言计划理论：公元前 3—4 世纪（第一个由亚历撒尔（Алексарх）创建的人工语言（Кузнецов 1987：53）至笛卡儿时代曾出现多次建构人工语言的尝试，但由于共同的语言计划理论尚未出现，这些尝试只能盲目进行，建构者使用的方法皆为试验性质且不正确。此外，笛卡儿哲学时代之前，所有的计划皆被当代人忽略，而搜集所有关于它们的资料则是在现代——19 世纪末及 20 世纪间，也就是国际语学出现之后才开始。因此，将建立语言计划理论归功于笛卡儿是完全有凭有据，因为在他之后，通用语言一定程度上稳固的研究传统才得以建立。

笛卡儿及其继承者将语言计划建立成规范理论，此理论提供一套语言学规定和原则性要求的制度给尚未获得交际实践的语言。因此当时语言计划及语言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是为互补——语言学研究现存或曾经存在过的语言，而语言计划理论则关注未来的语言。

根据研究目的，此理论尚无法与语言学本身相提并论。笛卡儿力求建构的不仅是合理的人工语言，尚有可改变人类思维的“哲学”语言。这种语言应是“类似某种人类概念的逻辑钥匙”（Дрезен 1928：42），使用它的同时，应可“以纯形式的方式，根据结论的某些规定得到新知识，此知识的真实性早已受到语言的哲学性质所保障”（Денисов 1965：10）。笛卡儿认为，“发明此种语言有赖于真实哲学，否则无法计算出人类所有的思想，并将它们按照顺序来配置”（见 Couturat, Leau 1903, 1907：11—14）。

尽管笛卡儿时代的唯理论语言学本身即以显著的哲学取向为特点，但将语言计划与“真实哲学”（也就是作为一种结合所有人类不同知识的元科学）等量齐观，即排除了将语言计划纳入语言学领域的想法。此后语言计划的历史如同语言学史，是它们脱离上述逻辑哲学综合体的过程，然而在国际语学领域中此演变却远比其他研究自然语言的语言学分支来得更晚。

计划语言的逻辑导向起于笛卡儿，并由莱布尼茨（Г.В. Лейбниц）、夸美纽斯（Я.А. Коменский）、孔狄亚克（Э.Б. де Кондильяк）、莫佩尔蒂（П.Л. М. де Мопертюи）、孔多塞（М. де Кондорсэ）及其他著名学者深入研究。

然而，尽管以人类知识分类为基础来建构人工语言的尝试不曾中断，但人们却逐渐认识到这类系统的交际不适用性：由于所有的分类语言皆以同一原则“相似的想法应以相似的符号表示”为基础，相似的概念即以不易区分的符号表示，例如，迪罗梅尔（Делормель）的哲学语言（1795 年）中：alvau ‘名词’、alavau ‘普通名词’、alevau ‘专有名词’、alivau ‘词根’、alidvau ‘派生词’及 alizvau ‘复合词’。此种语言的逻辑基础与言语的心理机制相对立，言语的心理机制要求的是近义词形式清楚对立的符号（Couturat, Leau 1910：5）²。

除了逻辑导向，17 世纪起，几乎与笛卡儿同时期，出现了另一个语言计划的导向，它可称为经验导向。

此导向的代表人物力求建构可供实际运用的系统，并不管该系统在逻辑关系中是否完善。例如第一个拉丁语简化方案及一些共同书写系统（如贝歇尔（И.И. Бехер）的编码通用符号，他尝试逐一列举拉丁文字，且未有任何逻辑概念分类即授予它们数字符号）。之后亦出现图画、手势及类似的人工语言方案。

我们可以看到，逻辑导向与经验导向是以功能关系作为区分：从语言主要的两种功能——交际与思维出发，逻辑导向将思维功能提至首要地位，忽视建构系统中的交际缺陷；而经验导向则隐性地以交际功能为首，并拒绝本质上改造自然语言的内容层面。

若逻辑导向通常将自身视为哲学及逻辑学，则经验导向于未来与相近理论划分界线的过程中、并成为建立现代国际语学的中心之前，从一开始便隔绝上述之哲学与逻辑学领域。

经验导向与语言学的关系亦有所不同，两者虽然皆研究自然语言，但语言学研究它们的结构，而经验语言计划则力求该结构合理化。

值得注意的是，经验导向长期处于寻找“通用语言”的外缘，且由于其支持者数量及研究程度有限，经验导向远落后于逻辑导向。即使语言逻辑方面的研究在国际语学中不具发展前途，该研究仍成为逻辑学及日后某些应用学科（图书馆学、纪实文学、主题分类及百科全书式词典理论，现代则是信息学）发展的主要动因。

上述的拉丁语简化方案及经验论的通用符号未曾被实际运用，且未有实质上的理论结果。因此，直到出现沃拉普克语之前，逻辑导向皆为语言计划的主要导向。1856—1858 年第一个研究国际语言问题的语言学机构——国际语言学会——亦支持对哲学语言的追求，该学会的成员包含为数众多的法国语言学家及其他国家的通讯记者。由学会组成的 23 人委员会发表对逻辑系统有利的言论，他们认为该系统应可作为将事物及概念“以通用分类为基础的目录”。上述将自然语言合理化的各种方案遭致否决，因为以此方式优化的语言会变得无法辨识，且会变得“缺乏理性、欠缺逻辑、自由任意及困难重重”（Couturat, Leau 1903: 723）。

委员会首次将过去所有被提出的方案分成后验方案（以自然语言为建构材料）与先验方案（失去与自然语言的关系）。之后尚增加混合型方案，该分类在国际语学中延续至今。而它与逻辑、经验系统的关系为何？

如上所述，界定逻辑或经验方案是以功能为取向，此界定与选择何种语言功能（思维或交际功能）为主要功能有关。而区分后验与先验方案并非以功能，而是以形式上的分析（语言计划与自然语言材料上的一致性）为取向。因此，功能分类与形式分类互有交集：经验系统可为后验（如拉丁语简化方案）及先验（如编码语言）方案。笛卡儿时代的逻辑系统中，先验性质的语言计划占多数，但我们将会看到后验方案亦可透过逻辑原则来创建。

在国际语言学会委员会的报告中，我们发现有趣的评论，此评论触及某些类似元语言的后验逻辑系统，这些元语言是为论述现存的自然语言而建构的。例如，提及利德烈（Летелье，来自法国康城）后验方案的过度困难时，报告的作者群评论道：“我们可以说利德烈先生的‘通用语言’创建目的并非以此语言作为交际工具，而只是为了分析所有我们已知的绝迹语言或活语言，并且可能用更精准的方式来表达它们的差异”（Couturat, Leau 1903: 74—75）。若语言“创建的目的并非以该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则交际功能即退至次要地位，而比较其他语言概念逻辑系统的任务或同类型的其他任务则被提升至首要地位。不只利德烈的方案，所有先验逻辑系统皆具有思维功能凌驾交际功能、并居于首要地位的特性。

18 世纪中叶出现对哲学方案的批判（莫佩尔蒂，1756 年；米哈埃利斯（И.Д. Михаэлис），

1759年),此批判证实概念系统化的不可能性,并注意到概念在时间中的可变性,因此必须对上述提及的分类进行实质破坏。此论点的完整论述由德斯杜特·德·特拉西(A. Дестют де Траси)于1817年言简意赅地宣告通用(逻辑)语言是不可行的,只因它原本就应该是完善的。因此,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认为必须改革现存的语言,增添这些语言所欠缺的性质(Destutt de Tracy 1817)。正是根据此观点,出现了第一批改革活语言的方案:斯拉夫语改革(萨佩尔(Г. Сапель, 1790年);库梅尔吉(Б. Кумердей, 1937年);吉尔克(Я. Геркель, 1826年);马雅尔(М. Маяр, 1863—1865年)、法语改革(谢法(И. Шипфер, 1839年)、英语改革(布莱德秀(Дж. Бредшо, 1847年)、德语改革(列赫登斯坦(Лехтенштейн, 1853年))。

此外,亦出现从数个欧洲语言中找出一致成分来建构人工语言的见解;首位根据此观点表达建构语言看法的学者为法国研究者夏尔·德·布罗斯(Ш. де Бросс, 1763年):“通用语言的基础确实存在;与其花费时间徒劳尝试找出人工可建构的东西,不如试图开启大自然已经创造的东西”(引文出自 Stojan 1929: 63)。来自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的国际语言学会成员瓦伦特(Vaillant)亦重复此观点:“通用语言是存在的,只需组合其零散的部分”(引文出自 Couturat, Leau 1903: 74)。³此原则大抵完成于1868年由约翰·皮罗(Ж. Пирро)所创建的后验方案“万有语”(универсальглот),该语言即以结合欧洲语言跨民族的成分为基础。

随着后验—经验语言计划的扩展,必须更准确地指出人工语言可使用的领域:最初有关新建的语言应该要取代民族语言的看法被打破;出现“辅助语”(вспомогательный язык)的想法,其目的在于以国际交流的专业手段来增补现存语言的不足;亦出现术语“国际语言”(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язык)(谢法(Schipfer, 1839年)是首次使用此术语的学者之一)。

然而,上述两种过程——语言计划的后验化与对未来国际语言辅助角色的了解——尚未汇聚成一体:某些方案的作者清楚认知到他所建构语言的辅助功能,但这些方案却仍是以先验逻辑为基础(如上述利德烈的方案,1852—1886年)。

此外,如同以往,这些方案建构的主要原则仍为:人工语言相较于所有自然语言而言,应是更完善的思维武器,并且必须取代它们。此谬误在计划语言及描述其实际功能的理论出现后才得以打破。

3 计划语言功能理论

人工语言的社会运用阶段始于1879年由牧师约翰·马丁·施莱尔(И.М. Шлейер)创建的“沃拉普克语”,他同意逻辑学派所有主要论点。为使自己的语言达到普及世界的程度,施莱尔赋予沃拉普克语丰富多样的形式。该语言的字母表设定为可表达世界主要语言的声音的符号(透过这些符号,尤其是专有名词应该可用最接近原有发音的形式来拼写)。该语言的语法是以逻辑原则来设计,然而词典却无分类基础,而是透过引进民族语言词汇(主要是英语)的方式来建立。此外,每个词汇在语音上的大幅改变使得外来语的词根变得无法辨识,因此,就词源而言为后验性质的词典,实际上却变为先验性质,亦即失去与来源语言的关系。此类语言称之为先验—后验语言,或混合型语言(见 Кузнецов 1976: 78)。此类语言未成为哲学(也就是具分类性质)语言,但它们完整保留逻辑语言的特性,逻辑语言中,思维功能相对于交际功能而言居于首位。

沃拉普克语的广泛成功——包括积极的语言运动出现及原创与翻译文学的创作——使它成为原则上新型的社会语言有机体:由人类从头至尾有意识地设计的人工语言首次获得社会运用。然而,正是语言的社会运用透露了该语言“功能转换”的不可接受性,此转换的不可接受性是所有逻辑系统的特性:对于语言的社会运用,最主要的功能无疑是交际功能,而非认知功能(思维功能)。沃拉普克语的社会运用及其逻辑构造之间的冲突于焉产生。此冲

突将该语言分裂成三种语言风格（称为典型、口语及俗语风格），其中仅第一种风格保留了沃拉普克语的逻辑结构，而第二及第三种则或多或少实行交际上的改良。

同时，上述该运动本身分裂成两个互不妥协的团体，其一以施莱尔为首，坚持一开始具有逻辑主张的沃拉普克语，而另一团体则以凯尔霍夫斯（O. Керкгофс）为首，他简化该语言，以使其社会运用更为广泛。正是第二个团体赋予沃拉普克语“国际交流语言”（德语：internationale Verkehrssprache、法语：langue commerciale universelle）的称号，而非先前的术语“全世界的语言”（德语：Weltsprache、法：langue mondiale）。但施莱尔与凯尔霍夫斯的冲突（就语言学学术而言），无非是同一语言中，逻辑和经验使用方式的冲突。

尽管沃拉普克语快速终止（该语言运动在其巅峰之后，很快于1889年完全解体），但施莱尔的方案开启了语言计划史的新阶段：首度出现对于研究建构语言在实际交流中的条件，人工语言理论有机会对它自身所提出的论点进行经验验证。

在此阶段才得以建立国际语学的现代认知：先前的语言计划理论（它规定未来语言的形式）增加了描述理论，此理论的目的是为研究先前已建构语言的社会实践。此两种理论（规则理论及描述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与语言学中使用的演绎法和归纳法有关。若过去语言计划对于语言学而言，仅处于外缘地位，则在经过社会运用的语言方案出现后，自然及人工语言的研究即处于同一地位：两种情况下的研究对象皆为社会实践所给予之客观存在的语言学现象。国际人工语言理论，尤其在术语“国际语学”出现后，便成为语言学的分支。

从大规模支持国际语言运动开始，不论是国际语学研究的客体（也就是语言），或是其“主体”：从单一研究者变成专为研究国际语言问题而特别设立的学者组织，皆具有社会性质。这些组织首先是国际语言研究院，也包括认可国际辅助语的代表团、国际辅助语协会等。

必须提及出现在我国（译者按：即俄罗斯）的国际语言支持者组织。最早创立为人数相对较少的沃拉普克语专家团体（Zilak Volapük d, 1889—1905年）。人数相对大增的是世界语协会（Эсперо, 1892年），会员人数达数千人。此外，亦曾出现中性成语（Idiom Neutral）（Grup Neutralparlant, 1905—1909年，日后为Grup Neutralist）及伊多语（Rusa Mondolingual Uniono, 1921年）支持者的小型组织。1916—1921年在彼得格勒（译者按：今圣彼得堡）曾出现国际语学会“Kosmoglot”，其荣誉主席为博杜恩·德·库尔德内（И.А. 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энэ）。

沃拉普克语问世后，国际语学的问题成为下列众多专业期刊的研究对象：《Interpretor》（1889—1890年），《Kosmopolit》（1891—1893年），《Linguist》（1896—1897年），《Discussiones》（1909—1913年），《Academia pro Interlingua》（1921—1927年），《The International Language Review》（1955年起）等。下列以研究个别竞逐的国际语言为主的期刊亦重视国际语学的众多问题：《Le Volapük》（1886—1889年），《La Esperantisto》（1889—1895年），《Lingvo Internacia》（1895—1920年），《Esperanto》（1905年起），《Progresso》（1908年起），《Mondo》（1926年起），《Kosmoglott》及《Kosmoglotta》（1922年起），《Revista de Interlingua》（1966—1983年），《Currero》（1964—1987年）等。

此外，必须说明的是，依靠国际语言社会功能的描述理论并非立即出现：起初仅限先前的语言计划理论得到大量动能，因为所有出现在沃拉普克语及后继方案于社会运用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皆以熟悉的方式，也就是透过改革运作中的语言或提出全新的方案来解决。之后出现众多改革方案（沃拉普克语改革版、世界语改革版等），它们在国际语学发展的新阶段形成具代表性的特点。沃拉普克语研究院脱离该语言的语言实践，创建了新的方案“中性成语”（Idiom Neutral, 1893—1898年），此方案是以一贯的后验原则来建构。类似中性成语的语言设计尚有之后1909年由米肖（А. Мишо）提出的罗曼那语（романаль）及1928年由叶斯柏森提出的诺维亚语（новиаль）。前沃拉普克语学者洛特（Ю. Лотт）及瓦尔（Э. де Валь）

建立自然学派，提出的方案为西方语（окциденталь，1921—1922年）和国际语（интерлингва，1951年）。世界语的作者亦脱离沃拉普克语，明示人工语言以社会（交际）功能为首要地位：他在第一本世界语课本中即说明，国际语言如同任何一种民族语言，皆是社会的财富（Заменгоф 1887：2）。

大量竞争激烈的方案引发如何从中选择的问题；此问题的解决⁴单靠语言学方法是无效的，一部分的原因因为国际语学尚未准备好提出评价人工语言的可靠标准，但最主要仍是因为轻视该问题的社会语言学层面。

从国际语言运动受到广泛支持开始即形成特殊现象，当某一方案在所有竞争方案中得到真正大规模的普及时，其他方案即被边缘化，而被边缘化的方案仅能在较佳的情况下由为数不多的支持者提出。

从 1879 年至 90 年代初大多数的国际语言支持者皆聚焦于沃拉普克语；从 19 世纪末至今，仅世界语得到真正的普遍推广。因此，所有提出的语言方案，自然可根据它们所代表的社会群体种类分为下列三组：广泛运用的语言（沃拉普克语、世界语），传播有限的语言（中性成语（идиом-неутраль）、无屈折拉丁语（латино-сине-флексионе）、伊多语、西方语、诺维亚语、国际辅助语协会的国际语），以及失去社会运用的语言（其余所有的语言计划）。

只有累积大量经社会运用的语言经验材料后，以上述前两组语言为目标的描述性国际语学才得以出现。所以沃拉普克语及世界语问世之后的数十年间，原依据笛卡儿语言计划传统的规范性国际语学仍强势发展。

在深入研究改革方案的过程中，新时期的语言计划分成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首先建立的是对先前各种方案的学术批判及系统分类的基础。该方向最重要的里程碑为库裘拉（Л. Кутюра）及罗（Л. Ло）的著作《通用语言史》（Couturat, Leau 1903）与《新国际语言》（Couturat, Leau 1907）。与此同时，新的后验语言计划观点已被完整表述，其任务是取代之前先验及混合性语言作者的理论。国际性原则、单一性原则及可逆性原则等得到了明确表述。

国际人工语言的描述理论长期落后于国际语学的批判发展。沃拉普克语的社会运用完全未获得等值的理论意义：该语言的生命周期过短而无法反映于上述的理论中。另一改革方案系列的“始祖”——世界语——同样长期未获得理论论述。世界语的“理论”实际上仅存在于大量反对改革世界语的批判形式中。于 1905 年成形的“基要主义原则”（принцип фундаментализма）可算是为数不多的正面成就之一，以该原则为基础，为保留语言完整性，几乎否决所有的改革尝试（Enciklopedio de Esperanto 1933：163）。“基要主义原则”是对批判世界语的概括反驳，但它自然无法成为独立的语言观点。

作为国际语学中最重要贡献——世界语的学术理论，竟然是因该语言和伊多语（идо）的论战，也就是世界语运动的分裂才得以形成。

我们不分析所有关于世界语和伊多语相对立的问题，仅探讨双方系统在构词方面的主要差异。

众所周知，柴门霍夫最初的方案中，所有的词素在功能上皆为平等，且以同等资格置入词典。因此，词根与派生词缀间的差异即被去除，派生词缀因而可被当作独立词根来使用（试比较：mang-ebla ‘食用的’ — ebla ‘可能的’；mir-inda ‘令人惊讶的、值得惊讶的’ — inda ‘值得的’）。若统一化扩及词根及派生词缀，则词根本身即更加统一：根据柴门霍夫最初订下的传统，世界语的词根会组成同一类别，且单词之间的差异并非由于词根的差异，而是连接词根的词类标记的对比（bona ‘好的’ — bono ‘善良’，类似于 patra ‘父亲的’ — patro ‘父亲’）。

法国著名逻辑学家库裘拉的著作于1907年问世，此著作对世界语构词理论的逻辑提出质疑(Couturat, 1907)。确实，观察以下各对词汇，如：labori ‘做工作’ — laboro ‘工作’、fondi ‘以…为根据’ — fondo ‘根据’、legi ‘读书’ — lego ‘阅读’，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将属名词范畴的-o 取代动词词尾-i 可以构成动名词。但在其他情况下，此规则却未能保留：verki ‘生产’ — verko ‘产品’（物品）、desegni ‘画画’ — desegno ‘图画’、kroni ‘加冕’ — krono ‘王冠’ 等等；gaja ‘快乐的’ 和 ĝoja ‘高兴的’ 有不同的名词 gajeco ‘快乐’ 和 ĝojo ‘高兴’，其中只有第一个名词有名词性后缀-ec。最后，某些情况下，动词与动作者的名称具相互关系，但它们的构成却不同：friponi ‘欺骗’ — fripono ‘骗子’、hipokriti ‘伪善’ — hipokritulo ‘伪君子’（hipokrito ‘伪善’）。

为解决上述问题，库裘拉提出所谓的可逆性原则，透过此原则，可使用同样的语言手段表达一致的语义关系。例如：他认为，“加冕”的词义应该透过 kronizi 的形式表达（此形式根据一般以-o 取代-i 的规则，可变成动名词 kronizo）。

库裘拉为建构伊多语而使用的理论，未被大多数世界语专家接受，但此理论仍给予受过语言学训练的读者深刻印象，并且对世界语的派生原则产生严重质疑。库裘拉的批判确实有其依据，因为词根统一化的理论完全无法解释为何会有未统一化的派生词存在。

瑞士数学家暨世界语专家雷内·德·索绪尔对世界语的构词学提出根本上不同的观点(Saussure 1910)。研究实际被运用于世界语的派生词后，索绪尔得出结论：必须拒绝词根统一化的理论。据索绪尔的观点，所有词根皆可分成如同词类的特定语法类别。若考虑到词根的此一附加特性，则可轻易地解释库裘拉提出的所有矛盾。的确，在 labori 一词中，词尾、词根本身（由于具过程意义）皆属动词范畴；正因如此，以属名词范畴的-o 取代不定式后缀-i 即可构成动名词；另一方面，在 krono 词中，不仅名词词尾，就词义来说，事物的词根亦属名词范畴；因此，在 kroni 词中，出现事物过程的意义‘授予王冠’完全合乎规律。索绪尔并不同意 kronizi 的形式，因为在此形式中使用了两个同义反复的后缀：-iz 和-i。同样地，hipokritulo 和 fripono 的差别在于，第一个词的词根 hipokrit-是属于动词范畴的词根（因此 hipokrito ‘伪善’是合理的），而第二个词的词根 fripon-则是属于名词范畴的词根，相应的后缀-ul-必须连接动词性的词根，方可构成动作者。

索绪尔的观点是国际语学发展的转折点，因为他首次证明了实际运作中的语言与语言方案的不同：若柴门霍夫的原方案中进行了词根的语法统一化，则如上所述，此特性即不被运作中的语言所接受，且交际过程中，自然会出现区分三种词根的词根词汇语法类别。从而确立语言计划与国际语学描述理论（也就是经社会运用过的语言的功能理论）的不同。

库裘拉的理论以语言逻辑优化来批判世界语为出发点。为求语言逻辑优化，在伊多语中不仅根据可逆性原则来改变派生法，之后实行的单一性原则（由奥斯特瓦尔德(B. Оствальд)提出）不仅去除同音异义词及同义词，而且实际上透过引用单词与语法形式极其细微的语义差别，来尝试去除自然语言所特有的多义现象。伊多语现存的众多词典里有诸多证明，例如：区别 astro 和 stelo（第一个指的是‘肉眼可见的星星’，第二个则是与‘行星’词义相反的‘恒星’）、intelektar ‘理解’（以理智来了解）和 komprenar ‘理解’（以感觉来领会）、asentar 和 konsentar ‘同意某事物’（第一个是同意观点、理论，第二个是同意具体的建议）等等（请见 Dyer）。前置词(de, di, da 相应于世界语的 de)及派生成分（如动词的后缀-iz-, -ig-, -if-, -ag-相应于世界语的-(ig)i-）皆具有相当不同的形式。因此，伊多语实现了恢复先前以思维功能为首的逻辑学派的原则。然而，此系统最终的失败即是因为轻视交际功能（归咎到底为轻视语言的社会功能）。

众多伊多语专家，首先是领导伊多语运动之经验派的柏夫隆(Л. де Бюфрон)，皆意识到该语言在交际上的复杂性。

现代国际语学中，经验原则的优势可用事实清楚说明：若在沃拉普克语时代，经验流派与施莱尔的逻辑宗旨相对立，则 20 年后体现于世界语的经验原则才是最主要的，而逻辑语言伊多语却持相反立场，然而，其自身亦出现将逻辑优化置于实际合理性之下的经验派别。

库裘拉与雷内·德·索绪尔具代表性的争论尚有语言计划的逻辑相对于语言结构的内在逻辑，此内在逻辑自然形成于语言运作过程中。事实上，库裘拉关于世界语无逻辑性、杂乱无章特性的论点与另一论点相对立，该论点实际指出，社会运用的语言不可能不具逻辑，若该语言已被说话者群体接受并运用，则其逻辑基础即会根据实际思维逻辑而形塑于语言运作过程中。

因此，叶斯柏森在其著作《语法哲学》中表达的观点值得我们注意。当提及逻辑与语法（自然语言的语法）之间的相互关系时，叶斯柏森正确地指出：“至今对语法所运用的逻辑是狭隘、特别形式的逻辑；其运用经常只是为了指摘口语的任何过程。我们必须以更宽广的视野来发展逻辑，例如：从逻辑角度来说，间接补语在同样程度上，如同直接补语，可成为被动句的主语，这是由于下列句子，如‘He was offered a crown.’的可能性问题，已从逻辑进入到实际运用的范围……这并非指不可用逻辑来看语法问题，而是必须避免肤浅的逻辑，因为该逻辑无法接受更为细心的研究证明某事物原来是完全正确的”（Есперсен 1958：42）。

以下两观点与国际语学有着最直接的关系：语言运用重于逻辑优化的论点，以及相较于语言学分析的逻辑，语言的内在逻辑提升至首位；叶斯柏森尚以下列形式提出上述第二个论点：“（自然）语言具有自己的逻辑。”自然语言内在逻辑性的开启（此逻辑性必须与交际适宜性有关），是划分语言学与逻辑学过程的本质，该过程完全实现于自然语言理论中，而较晚实现于人工语言理论中。

尽管叶斯柏森开启自然语言的内在逻辑，但他却不承认，即使获得社会运用后的人工语言具有此特性。叶斯柏森拒绝使用形式逻辑来评价口语，但他在《语法哲学》书中多处以形式逻辑的角度来比较世界语及伊多语，并对它们进行评价。例如，叶斯柏森反对世界语的形容词依照“数”来改变，但他只注意到逻辑上的不连贯性（因为世界语的动词与冠词皆没有数的形式（Есперсен 1958：241））。若将目光转向“口语”，并欲知形容词数的形式具有何种交际价值，以及它们在交际中的重要性，我们将提出完全不同的问题。在研究语言的实际运作后，我们或许得出以下结论（此结论与众多世界语专家的观察吻合）：形容词数的形式可较容易建立它与名词间一致的句法关系（就像无需再以另外的句法手段来证实名词与冠词间的关系）。

如同叶斯柏森在自然语言中发现内在逻辑，雷内·德·索绪尔亦开启人工语言的内在逻辑，进而使国际语学摆脱对计划语言强加于其格格不入的先验逻辑观点。

附注

1 Кузнецов С.Н. Основные этапы становления интер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й теории. Проблем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вспомогательного языка.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1. С. 25—40. (С.Н. 库兹涅佐夫，〈国际语学理论形成的主要阶段〉，《国际辅助语的问题》，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1，25—40 页。)

2 此由国际语学经验所得的结论与神经语言学的经验研究有着有趣的相似之处（见 Лурия 1975：152—155）。

3 德列津并未正确地转述此引文（Дрезен 1928：102）。

4 主要是认可国际辅助语的代表团以及国际辅助语协会提出选择的问题。此两组织最后建构了自己的国际语言方案（伊多语，1907 年；国际语，1951 年）。

参考文献

- [1] Григорьев В.П. О некоторых вопросах интерлингвистики[J].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1996, № 1.
- [2] Денисов П.Н. Принципы моделирования языка[M]. Москва, 1965.
- [3] Дрезен Э.К. За всеобщим языком (три года исканий)[M]. М.-Л., 1928.
- [4] Есперсен О. Философия грамматики[M]. Москва, 1958.
- [5] Заменгоф Л. Эсперант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язык. Предисловие и полный учебник для русских[M]. Варшава, 1887.
- [6] Кузнецов С.Н. К вопросу о типологической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искусственных языков[M]. Москва, 1976.
- [7] Кузнецов С.Н. «Плановый язык» как социо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е явление. – Вопросы социолингвистики[A]. Доклад и тезисы советских социолингвистов к XI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у конгрессу социологов в Нью-Дели (август 1996 г.)[C]. Москва, 1986.
- [8] Кузнецов С.Н.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основы интерлингвистики[M]. Москва, 1987.
- [9] Лурия А.Р. Основ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нейролингвистики[M]. Москва, 1975.
- [10] Couturat L. *L'Étude sur la Dérivation en Esperanto*[M]. P., 1907 (2-е éd. см. Couturat, 1910).
- [11] Couturat L., Leau, L. *Histoire de la lingua universelle*[M]. P., 1903 (2-е éd., 1907).
- [12] Couturat L., Leau, L. *Nouvelles langues internationales*[M]. P., 1907.
- [13] Couturat L., Leau, L. *Compte rendu des travaux du comité (de la Délégation pour l'adoption d'une Langue auxiliaire internationale)*[M]. Coulommiers, 1910.
- [14] Destutt de Tracy A. *Eléments d'idéologie*[M]. Vol. II. P., 1817.
- [15] Dyer L.H. *Ido-English Dictionary*[Z]. L., 1924.
- [16] *Enciklopedio de Esperanto*[M]. Vol. 1. Budapest, 1933.
- [17] Jespersen O. *A New Science: Interlinguistics*[M]. Cambridge, 1931.
- [18] Kibernetiko de la homa lingvo kaj aliaj internacilingvaj aktoj de la IX-a Internacia Kongreso de Kibernetiko. [Namur, 1980][M]. – Budapest, Paderborn, 1981.
- [19] Kuznetsov S.N. Ontological Qualities of Language and Possibilities of their Verification[A]. – 8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Logic, Method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Abstracts[C]. Vol. 1. Moscow, 1987.
- [20] Meysmans J. *Une science nouvelle. – Lingua Internationale*[M]. Bruxelles, 1911, N. (нем. пер.: – Plansprachen. Darmstadt, 1976).
- [21] Sakaguchi A.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Object of Interlinguistics[A]. – XIV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Linguists. Berlin, August 10 to 15, 1987[C]. *Abstracts of Section Papers and Round-Table Talks.* – B., 1987.
- [22] Saussure R. de. *La construction logique des mots en Esperanto*[M]. Genève, 1910.
- [23] Schipfer J. *A Grammar for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M]. Wiesbaden, 1839.
- [24] Stojan P.E. *Bibliografio de la internacia lingvo...*[M] Genève, 1929.

Chief Stages in the Formation of Interlinguistic Theory

S.N. Kuznetsov / Chang, Jui-Cheng

(Department of General and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Faculty of Philology; Lomonosov Moscow State University, Moscow 119992, Russia)

Abstract: Interlinguistics was acknowledged as a branch of linguistics by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Linguists in 1931. But some basic ideas of this scientific discipline had been formulated as early as 1629 by R. Descartes and later by his followers.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interlinguistics was made by René de Saussure (a younger brother of Ferdinand de Saussure). The chief subject of this discipline is the class of “planned languages”, i.e. artificial languages designed for international use and accepted by a number of speakers.

Key words: Interlinguistics; international languages (interlanguages); artificial languages; planned languages; Esperanto; esperantology; logicism

译者注: 2016 年对语言学而言是极为重要的一年。今年不仅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创立 200 周年、费迪南·德·索绪尔的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问世 100 周年，亦为本文中提到以博杜恩·德·库尔德内为荣誉主席的国际语学会“Kosmoglot”成立 100 周年 (1916.04.28) 纪念日。这些纪念日皆促使我们以新视角来看待语言学的历史及其未来展望。

作者简介: 谢·尼·库兹涅佐夫 (С.Н. Кузнецов) ，俄语语言文学全博士，先后为俄罗斯科学院语言学研究主研究员 (1977—1996) ，国际科学院协会会长 (1991) ，圣马力诺国际科学院院士 (1993) ，国立莫斯科大学语文学系普通暨历史比较语言学教研室主任 (1997—2004) ，现任国立莫斯科大学语文学系普通暨历史比较语言学教研室教授。

译者简介: 张瑞承，男，国立莫斯科大学语文学系普通暨历史比较语言学教研室博士生。

收稿日期: 2016-04-25

[责任编辑:张春新]